



1909—1989

陕西省图书馆《馆史》组 编著

陕西省图书馆馆史

任继愈



陕西教育出版社

陕西省图书馆馆史

〈1909年—1988年〉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编写委员会：

主 编：武复兴

副 主 编：张连寿 李鼎铭

顾 问：刘依仁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u>王伯权</u>	许力军	李鼎铭
张连寿	武复兴	周广庆

序 言

武复兴

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社会借以进步的阶梯。不能设想不重视知识积累的国家和民族，能有较快的发展进步。因而图书馆事业就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发展水准的重要标志之一。

中国古代藏书集中于皇家和个别官僚士绅手中，仅供少数人阅读使用，因而极大地限制了文化的普及和发展。清朝末年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许多人主张以西方国家为榜样，设立公共图书馆，以开启民智，继承传统和发展实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宣统元年（1909）八月，成立了陕西图书馆。它属于全国最早成立的公共图书馆之一。

陕西图书馆最初设在西安梁府街学务公所所管辖之陕西官书局中（今青年路西安市第二印刷厂一带）。民国四年（1915）迁至南院门原清代陕西巡抚衙门东花园旧址上的劝工陈列所中，即今陕西省图书馆南院。这里在明代以及清初，曾是著名的正学书院所在地。今其附近的正学街，即因此得名。相传宋代著名哲学家张载、程颢等人，亦曾在这附近讲学（见《西京指南》）。

图书馆南院中的一座多处磨砖雕花、不出檐的二层小楼，便是最早陈列图书的地方。这座楼为劝工陈列所的主要建筑，建于清代末年。公元一九〇〇年慈禧太后因“八国联军”

之祸逃来西安。第二年她返回北京时，无法带走许多各地所送如漆器家具、丝绸、工艺品、宫灯等贡品，遂移入这座楼房，加以陈列。而民间则呼为“亮宝楼”。图书馆迁来后，这里主要成为藏书的地方。楼门额上有清皇家南书房陆润庠代慈禧太后取程颢“万物静观皆自得”诗句意所书“静观自得”四个大字。十数年后，保皇尊孔的康有为来西安时又为省图书馆题“兰台石渠”牌匾一块，落款处特书“孔子二千四百七十四年癸亥冬南海康有为题陕西图书馆”等字。此匾现悬挂于省馆历史文献部中。现图书馆南家属院南门，原为馆正门，门额石上所雕“中山图书馆”五字，为一九二七年时任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的于右任先生所书，落款处除“于右任”三字外，专题“民国十六年五一节”等字。从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名人题字或落款中，似乎也可略窥知通过图书馆所反映出来的时代气息和题字者的倾向性。

陕西省图书馆的藏书堪称丰富。对解放后国内各种出版物大都收藏，自不必说。对与陕西工、农业和研究事业密切相关的英、美、法、苏、日等国的各类自然科学期刊，以及台湾、香港等地有关的出版物，也尽力收藏。其中最富有特色的，还是本馆所藏一批善本书。如宋、元刻《磻砂藏》全书六千三百六十二卷，陕西馆即藏五千五百九十四卷，收藏量和书之品位均居全国首位。再如明万历版《海刚峰集》，是国内现存最早的刻本，吴晗先生在写著名的《海瑞罢官》历史剧时，便曾参考此书。

陕西省图书馆至今已经历了八十个春秋。回顾近一个世纪中这座图书馆的发展过程，不仅有便于清理资料、了解历史、总结经验，也有利于作为我省现代文明窗口的这座大型

公共图书馆的进一步发展提高，有利于深入开发馆藏资源，为改革开放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正是在这种考虑下，我们当建馆八十周年馆庆之际，组织人力，费一年多时间，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成这本《陕西省图书馆馆史》。由于资料不全，对散居各地的老前辈也未能全部拜访到，特别是由于编者水平的限制，因而其中的错误、缺漏在所不免，恳切希望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1988年8月于陕西省图书馆

谨以此庆祝

本馆成立八十周年暨

西安解放四十周年

發展國之銘于世。

授于人民之紀念。

加陳第國銘于國年

王蒙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长王蒙題詞

发展图书事业

振兴陕西文化

孙达人

1989.1.18,

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孙达人题词

努力发展图书事业，
提高人民文化素质。

霍绍亮

一九八九年元月三日

陕西省文化厅厅长霍绍亮题词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建置与沿革	(1)
第二章 馆舍变迁及建设发展	(30)
第三章 机构设置与人员编制	(44)
第四章 八十年来藏书建设综述	(85)
一、解放前四十年的藏书概况	
二、解放以来藏书的建设与发展	
三、藏书组织分编的变更与健全	
第五章 读者工作的今昔	(128)
一、书刊流通及辅导阅读活动	
(一) 解放前四十年的简况	
(二) 解放以来, 充满活力的书刊流通工作	
(三) 形式多样的阅读辅导活动	
二、别开生面的读者联谊活动	
第六章 为本省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卓越	
贡献的研究辅导工作	(177)
附: 陕西省图书馆纪事	
(1909年 - 1987年)	(184)
编后记	(324)

第一章

建置与沿革

清代末期，改良、革新、变法之说，倡于一时，学习西方之风，风靡国内，这就从客观上要求图书从原来官方或寺院中的藏书楼中解放出来，普及到民间去。各省、地建立公共图书馆，供群众借阅势在必行。1896年（清光绪22年）刑部侍郎李端棻，在奏请推广学校一摺中，便涉及到各省普设“图书馆”之事：“依乾隆故事，更加推广，自京师至十八行省省会，咸设大书楼，调殿版及各官书局新刻书籍，暨同文馆及制造局所译西书，按部分送各省以实之。其或有切用之书，为民间刻本官书局所无者，译局随时咨送。妥定章程，许人入楼观念，……”虽未提出“图书馆”名称，但已提出公共图书馆之雏形及其藏书开馆办法。光绪24年，清政府在直隶省创设了直隶藏书楼，这是我国第一所地方“公共图书馆”。1906年湖南省继直隶藏书楼后，又成立了我国一所集资官办的图书馆。随之，两湖总督端方倡议开办了湖北图书馆。1907年江苏建成江南图书馆。1908年山东筹建山东图书馆。

陕西大员巡抚恩寿，提学史余坤，为建置陕西图书馆，早在1907年5月曾上奏清廷。其奏摺称：“近今轮轨交通，

驿驛四达，欧美各邦，罔不于各都巨埠，广建书楼，征求册典，所以开浚神智，增进文明，法至善也。陕西山河重阻，兵燹屡经，文献凋零，士风固塞，将欲交换知识，自宜广事搜罗。奴才忝膺疆寄，兢兢以兴学育才为念，当飭提学史余坤，仿照东南各省建置图书馆，收藏报籍，并采购教育品及各国图书，籍资考证，……。”经过各方周折努力，终于1909年8月，陕西图书馆于西安梁府街原梁化凤府址（现青年路共青团西安市委所在地）学务公所内之左侧建成。

一、创建初和民国时期的陕西图书馆

新建的陕西图书馆，由理学家、贡生、三原贺伯箴为督监（即馆长）。全馆房舍为楼房三重，约50余间。其藏书宗旨为：“一曰收藏旧籍，二曰广征群籍，三曰列邦新书，四曰吉金乐石。”并收旧有官书局铅印排字机器及石印器具，归并整齐，兼办印刷。因此地较为偏僻，且单一的图书数量少，乃“购藏略备，而览者寥寥。”

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随之失败。军阀混战，陕西数易省督，图书馆长职务，也不得不数经变易。壬子（1912年）之夏，贺伯箴先生去职，晚清举人，经学家毛俊臣先生任馆长。执事未久，又以朱先照先生继任之。未及一年，于1914年由省署教育科科长、河北清苑王文芹先生兼代馆长。这个时期因图书馆无固定经费，数年间除毛俊臣馆长任内编过一册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馆藏书本目录外，别无大的建树。

1915年（民国四年），在王文芹先生任职期间，因原梁府街旧馆址馆舍狭窄、地僻，交通不便，经多方奔走，于5月间迁图书馆至当时西安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地带的南院门街之南院（清代巡抚部院，民国后为省议会所在地）东隅“劝工陈列所”地址。“劝工陈列所”附设于图书馆，并兼有“西安碑林”，定名“陕西图书馆”。

南院门，人口集中，商业繁荣，来馆阅览参观者甚多。陕西图书馆除供群众读书、阅报外，尚陈列有工艺、文物及博物标本等。阅览、参观仍按原“劝工陈列所”规定，每人每次收铜元二枚（相当现在二分），学生、军人减半。

1916年，陕西护国军兴，王文芹先生去职，以省财政厅孙小眉暂涉馆事。5月，图书馆直接归省政府管辖，省督兼省长陈树藩委请陕西社会教育界名流高树基（培支）兼任图书馆馆长。

高树基先生，治学严谨，知识渊博，且为人清廉正直，热心社会教育，提倡移风易俗，人多敬仰之。时图书馆不足十人（包括劝工陈列所、西安碑林），每月经费500元（其中200元为陈列所经费由省实业经费下开支），购书费月仅50元。先生常解囊买书送馆，所欠书款统成私债，且赔累不堪，虽呈恳而无闻，或以“经费稍裕，再行核发”的批复而拖欠。直到1934年邵力子先生主持陕务时，闻知此事，敬先生之为人，方令补给以偿“私债”。时先生已离伍，从事教育与戏剧改革工作多年了。

高树基先生担任图书馆馆长，每兴一事，常叹“治事之难”。然乃多方奔走呼吁，先后收回辛亥革命以后，被军队、陆军医院等单位占据的图书馆后院旧园圃、房屋（即现

省图书馆所在地)等。1917年4月,前省长李根源捐赠图书20000多册,并筹拨给图书馆临时修善费,即将收回的园圃重新修建,凿池叠石、栽林莳花,开辟阅览室,休息室、阅报亭、接待室、标本室等。最北面建有动物房,院中以树木代表县治修组成陕西省地形图。园亭之间设一茶社,使读者处此林静花香之间,襟怀爽适。对内整理图书、编制目录,修订制度,制定《陕西图书馆章程》(劝工陈列所附),列管理办法共14项134条,于1924年公布实施。又编成陕西图书馆建馆以来第二部成册书本目录——《陕西图书馆书目》,共六册。高树基先生亲自撰写《陕西图书馆书目缘起》之前言,以记其事。书目以铅印线装本汇成,并第一次作为交流资料分送各省图书馆。嗣后多年,天津、浙江、云南等省图书馆咸有见赠,而陕西馆愧无一复。

当时,由于陕西山河重阻,民风阻塞,封建压力仍然很大,妇女涉足公共场所,时遭非议。图书馆虽为文化园地,妇女亦甚少来馆。高树基先生提倡“移风易俗”,特于图书馆内设《女阅览室》、《女休息室》,鼓励妇女来馆阅读、溜览,开社会风气之先。

陕西图书馆经过这次扩充,面积由原来的621.27方丈增加到1150.49方丈,图书增多,报刊略备,并增设阅书、阅报室多处,另设特别阅览室(相当今日的“专家阅览室”),还美化了环境,亭园相辉,花木繁殖,树木参天,来馆阅览者日益增多。高树基在任期间,馆内成员中有一位王天士(陆一),此人才学横溢,被于右任先生赏识,后调民国中央政府监察院为于先生部下,1946年派任为晋陕监察使。

1926年4月,北洋系军阀镇嵩军刘镇华犯陕,西安被围

围期间，城内军民同仇敌忾，忍饥苦挣。此时，图书馆几乎门可罗雀，馆长仅能闭门守舍而已。11月围解，于右任先生任国民联军总司令、陕西省长。于右任以联军总司令命令公布：开展平民教育，改善教育人员待遇；公布创立学校、捐助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诸有关教育事业的褒奖条例，等等。

1927年4月，图书馆划归省教育厅领导。史维法先生任馆长，改“陕西图书馆”为“陕西省中山图书馆”，撤销“劳工陈列所”。在馆内设“平民教育委员会”。教育厅还在莲湖公园内增设“陕西平民图书馆”，于府学街原文庙内设“陕西省立四三图书馆”（四月三日为陕西教育革命纪念日）。并于北大街（现人民剧院对面）开辟“平民阅览室”，广泛宣传、推荐革命图书。可惜时间不长，政局又变，“宁汉合作”，蒋、汪、冯合流反共，7月23日，冯玉祥漾电到陕，陕西陷入反动恐怖之中。于右任离任赴南京，杨明轩教育厅长仓促而逃，图书馆馆长史维法先生亦匆匆离职东去。图书馆一切进步措施，只留下一块“中山图书馆”石刻牌匾和“平民教育委员会”空名。

1928年，冯军撤离陕西，冯玉祥在南院门（今街心花园处）为宣传基督教义修建的“洗心堂”被拆除，利用其原材料在图书馆北院修建了七间大礼堂，归图书馆作为集会、讲演、展览使用。时姬在泮先生任馆长。

1931年春，教育厅指示：将“平民教育委员会”迁入北花园，成立“陕西民众教育馆”，将图书馆北院园圃，连同所有建筑全部划归“陕西民众教育馆”，以“静观自得”楼后十间展室北墙为界分隔，以东面（马坊门街）旧园圃门为

大门。原图书馆内所有工艺陈列与标本、动物等均移交给“民教馆”。西安群众旧称图书馆“静观自得”楼为“亮宝楼”。自工艺、标本等陈列品移入“民教馆”三层角楼（今省图书馆采编部小楼处）后，群众又渐指该角楼为“亮宝楼”。甚至以后混称“民教馆”为“亮宝楼”。抗日战争时期，李敷仁先生曾任职于民教馆副馆长，先后主办《老百姓报》与《民众导报》，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之腐朽与黑暗，宣传进步思想，在广大读者群众中很有影响，因而“亮宝楼”也为人所熟知。

图书馆紧缩单设后，重新整理、登记了全部图书，在旧的四部分类基础上，增用了《杜威十进分类法》改编藏书，增设卡片式目录（类名、著者、书名）三种与书本目录同时存在使用。其索书号码以《杜威十进分类号》与《王云五四角号码》互相参用。此为陕西省图书建立使用卡片目录检索之始。

同年7月6日，陕西省政务会议公布《陕西省立图书馆暂行规程》，改馆名为“陕西省立第一图书馆”（实际上并无第二个图书馆），以长安张俊青先生代姬在津任馆长，制定《保护碑林法》十五条。馆内增设“儿童阅览室”，另设“古物陈列室”一所，供爱好和研究陕西地方历史者参考。

“九·一八”事变、“一二·九”运动先后爆发，广大群众关心国事、时事，图书馆为适应群众需求，提高国民抗日情绪，于1932年3月19日特辟“抗日图书研究室”，撤销原来各阅览室，另组成第一、第二、第三（报刊杂志）三个阅览室，开架阅览。此是陕西省图书馆阅览室“开架阅览”